

敦煌文献与佛教 研究文集

李德龙摇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文集

作 者 李德龙

责任编辑 红梅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0 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 68993153 (发行部) 传真：(010) 68993153 (发行部)

(010) 68993153 (总编室) 摇 摇 摇 (010) 68993153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85 毫米 × 116 毫米) 印 张 32

字 数 2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陈 1 号 陈 1 号 陈 1 号 陈 1 号

定 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摇摇言

李德龙同志的《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文集》正式出版了，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同道，十分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并希望他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我与德龙同志相识是在一九八二年，当时，他还在跟随我的好友著名史学家宁可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当年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季羨林先生任会长，宁可先生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学人，参与了学会的部分工作，德龙同志有时受宁可先生所托与我联络些事情。三年之后，德龙同志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与我成了同校的同事，后来，他在教学之余翻译了日本学者冲本克己、木村隆德、原田觉、西冈祖秀、岩崎力诸君研究敦煌藏文文献和中国佛教的学术论文，陆续发表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我组稿并主编的《国外藏学译文集》（已出版四辑）中。作为文章的译者，德龙同志与我的接触机会更加多了起来。

在与德龙同志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他是一位接受过严格系统专业训练、聪颖智慧、极有些才气又肯于用功的青年，当初我就觉得他会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果然不出所料，他撰写的源万余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唐后期寺院经济的特点》被台湾学术界选为优秀佛教学论文，编进《中国佛教学术论典》全文出版。他撰写的总量万余字的《敦煌写本 授戒牒 初探》一文，不仅以真实的敦煌资料匡正了学者对于度牒、戒牒性质的模糊认识，也纠正了日本研究中国佛教的权威学者中村元关

于“现存最早度牒为明代”这一欠妥的说法，该文在 1991 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在后来成为他博士生导师的王锺翰教授庆祝诞辰 80 周年学术论文集中，至今 20 年无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任何异议，说明他言之有理。

德龙同志研究的重点一度集中在唐代寺院经济方面，他于 1982 年发表的《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唐代寺院经济与佛教宗派》等论文曾被一些复印资料专刊所转载，也被部分学者在专著中多次引用。尤其是他对禅宗在唐武宗灭佛后的兴起，能从各种佛教宗派对寺院经济的依赖程度上来考察，在理论方法上有所突破。

由于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德龙同志也注重研究与民族相关的学术论题，他先后撰写了《敦煌遗书 杂录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敦煌遗书 茶酒论 与藏族寓言故事 茶酒仙女》等一系列论文，使不少从事回鹘（维吾尔）、吐蕃（藏族）等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从中受到了不少启发。

由于德龙同志脚踏实地的研究工作以及每文必有新见解的成就，不仅使他在国内敦煌学界、佛学界有了一些影响，而且也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1980 世纪八九十年代，季羨林先生集全国众多敦煌学专家编写的《敦煌学大辞典》，诚邀德龙同志撰写其中近 100 个辞条，可以说每一条都是一个新创造，因为以前没有任何一本哪怕是再小的敦煌学辞典。德龙同志也作为敦煌学者被列专条登载在辞典之中。新世纪伊始，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岐阜圣德学园大学等单位，闻知德龙同志在敦煌学、佛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先后邀请其赴日讲学。德龙同志在异国他乡用日语为几所日本大学的教授会、研究生做了《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价值》的学术演讲，并回答了日本学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为我国学术界争了光。

据我所知，德龙同志是国内较少的几位通读过英、法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部汉文敦煌文献缩印胶片的学者之一，因此，他对敦煌文献的了解是比较全面的，他撰写的数万字的《千古文化的百科全书——漫谈敦煌文献》，是一篇典型的专家普及敦煌文献知识的力作，既通俗好懂，又不失学术水准。

其实，德龙同志在上大学之前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大学毕业以后从事历史学专业，而他的学术兴趣也是非常广泛的，决不仅仅局限于敦煌学与佛教研究领域，他曾撰写并出版了《汉初军事史研究》（~~四~~万字），《黔南苗蛮图说研究》（~~四~~万字）等学术专著，曾经翻译并出版《古代中国的思想》（~~四~~万字）、《中国古代史论稿》（~~四~~万字）、《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四~~万字）等学术论著。~~四~~年，他继著名学者潘光旦（仲昂）、陈述两老先生之后，以历史学教授的身份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果然不负前人所托，先后完成了多项古籍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现已见到的正式成果有他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历代日记丛钞》（~~四~~册）、《中国民族问题档案资料集成》（~~四~~册）《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猿~~册）等等，卓然有成！

面对德龙同志的这些学术成果，我作为同事、同行，十分欣慰和感慨。我相信，德龙同志还会不断努力，勤奋钻研，刻苦工作，还会有更多的新成绩展示给他的老师和他的学生。

最后我想说的是德龙同志曾经师从我所崇敬的著名清史大家王锺翰先生，他从王先生身上不仅学到了丰厚的清史、满文等专业知识，更继承了钟翰先生忍辱为学、孜孜不倦、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为人厚道、谦恭尊让的美德，德龙同志曾经把钟翰先生的《甲丁日记》（~~四~~—~~四~~）手稿影印出版。如今，锺翰先生已经作古数年，德龙同志的文集出版在即，泉下有知，当以为慰。鄙人不才，愿意略述数语，以为序文，兼作纪念。不由得记起刘

禹锡《西塞山怀古》一诗中有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于中央民族大学

圆 年 愿 月 愿 日

自摇摇序

作为一名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如同一位学生通过努力考出了令人鼓舞的学习成绩一样、又像一位农民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之后获得丰收一样，充满喜悦。

回顾我的学术历程，似乎有些“见异思迁”、“随波逐流”，用褒义的词汇形容，也可以说自己就像一名游击队员，在史学研究的阵地上灵活作战，而且间有战果。

在读大学之前，“文革”尚未结束，十六七岁的我，高中还未读完，就像初生的牛犊一样，创作了不少的诸如相声、快板书、锣鼓词之类的文艺作品，提供给群众演出队在北京乡间到处表演，甚至居然敢于抒写“诗歌”投稿于《北京文艺》等杂志，并且偶有发表。高中上了一年半，就算毕业了，提前参加工作，成了一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的通讯员，在全国普及大寨县的热潮当中，奔跑于北京远郊九县，当时被称为“土记者”，采访生产队长、宣传劳动模范，发表了十几篇新闻通讯。记得 1976 岁那年（1976），竟然身背录音机，采访了唐山大地震灾害之后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慰问北京郊区插队知青的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制作了一组录音新闻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郊区农村广播”节目里播放，并同时将自己写好的新闻稿件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现在想来，当时自己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1977 年恢复高考，我的初中班主任朱（健增）老师（后任国家新闻出版署人事司司长）知道我在报纸、电台发表了一些小文章，叮嘱我一定要报考新闻专业。可是，在离高考还有两个

来月的一天，我在驻队公社机关食堂吃饭时，一位公社教育革命领导组的董（泰昌）老师不经意地对我说，“听说你要考文科，可你知道唐太宗叫什么吗？”我没有底气地回答：“是不是叫李世民？”董老师又问：“那唐太宗他爸爸叫什么？”我答不上来了。说实话，从我上小学二年级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1966年离开中学校门，从来没有正经上过一节历史课，我哪能回答董老师的问题，便反问董老师：“您知道吗？”董老师不屑地对我说“我当然知道，唐太宗叫李世民，他爸爸叫李渊，我还知道他爷爷叫李虎呢！”董老师是“文革”前北京市重点中学的老高三毕业生，在人民大会堂听了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报告后，自愿到农村当了一名教师，他的学问功底很好。我那顿饭没吃完就一头扎进宿舍，下定决心要考上大学，不学别的，就学历史！第二天，立即到原来读书的中学和老师家里寻找历史课本，但是，在1966年的北京郊区，怎么也找不齐一套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教科书。没有办法，只有夜以继日地拼命背诵政治、练习作文，后来在高考中，由于我的这两门分数较高，终于在当年北京市录取率10%的情况下，如愿以偿地被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开始了历史学科的学习。当一个人带着强烈的愿望从事一个专业的学习时，他绝对会不遗余力，各级大学生几乎人人如此，我这个亟需恶补历史知识的人更是夜以继日都在拼命地吸允着历史专业的营养，玩命读书自不待言，为了学习常常是通宵达旦。一二年级两门通史课学完之后，从大学三年级我们系开设了12门选修课供学生选学，我自然是多多益善，只要有时间就去听各种专业选修课。记得我选修了由北京大学王永兴教授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开设的“敦煌文献研究”和北京大学张广达先生在我校开设的“国外敦煌学与中亚历史”的讲座以及本系宁可教授开设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等课程，就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敦煌吐鲁番

文献，热爱上了敦煌学。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从西州退田文书看唐代均田制的演变》，毕业时获得了学校首届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从此，我对敦煌学、佛教学的兴趣更加浓厚。

1952年考上了宁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三年间饱览了全部英藏、法藏和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汉文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写出了数千张资料卡片，为后来编辑《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15册）奠定了基础，也积累了大量的学位论文资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利用敦煌文献资料，对唐后期佛教寺院经济进行探讨，题目是《试论唐后期寺院经济的特点》，由于论文材料准备充足，在毕业答辩时，以著名教授何兹全先生为主席的匿名答辩委员会委员给与了一致的好评。后来，这篇源万多字的论文作为优秀佛教学术论典在台湾全文刊载。

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最初几年，仍和我的导师宁可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的周绍良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弓先生、宋家钰先生和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沙知教授以及我的师兄首都师范大学的郝春文教授、我的师弟徐庆全等学者一起编辑大型敦煌资料丛书《英藏敦煌文献》，众多学者或各自查阅资料，分析一件件千余年的敦煌文献，或一起开会，畅所欲言，共同研讨每一件英藏敦煌汉文文献名称、性质。其间，我也在教学之余，撰写了两篇敦煌文献研究的论文，一篇是《敦煌写本授戒牒初探》，一篇是《敦煌遗书杂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此间还撰写了《唐代佛教宗派与社会经济》，也是利用敦煌佛教寺院文书，探讨佛教宗派形成演变的论文。另外，通过近15年整理敦煌文献的感受，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富有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的敦煌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因此应北京燕山出版社之邀，撰写了《千古文化的百科全书——

漫谈敦煌文献》的长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敦煌文献的丰富内容及其宝贵价值。

由于自己在学术上的“见异思迁”，到了 1949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受中国军事科学院的邀请，与同室好友刘曙光一起，参加了《中国军事通史》的研究项目，撰写出了《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卷》和《汉初军事史研究》两部著作，研究领域从隋唐向前跳到了西汉。50 年代末到日本留学，回国后考上了著名清史、民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又开始攻习满文，并在《清史稿》、《清实录》以及《清史列传》等文献中苦读，最后选定了清代的南方少数民族文献《苗蛮图》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并出版了《黔南苗蛮图说研究》的专著，研究领域又从西汉跨到了清代。

虽然如此，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所钟爱的敦煌文献和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始终没有彻底放弃，在各个阶段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当中，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一直在魂牵梦绕在我的心间。就在我从事西汉军事史和清代民族史研究的过程中，我还是撰写了《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敦煌遗书 茶酒论 与藏族寓言故事 茶酒仙女》等论文，同时翻译了《敦煌发现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冲本克己著）、《吐蕃译经史》（原田觉著）、《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的性质》（木村隆德著）、《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目录初稿》（木村隆德著）等日本学者研究敦煌文献在论著近 140 万字，分别发表在《国外藏学研究》等书刊上。1974 年 远月，我受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务委员会委员长冈田洪二教授的邀请，到该校及东洋大学举办学术讲座，我讲演的题目是《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价值》。由日本佛教团体支持的岐阜圣德学园大学，是我曾经留学的学校，听说我正在日本举办学术讲座，又是专门讲述敦煌佛教文献，于是特邀我到岐阜去讲演，我的讲演日文原稿全文登载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

的学报《大东亚学论集》第 源号上。

圆源年 源月我担任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第八任馆长一职，还是由于我在史学道路上的“见异思迁”，当我见到图书馆内有许多珍贵的民族古籍之后，便开始了民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首先撰写了圆万多字的《乾隆御笔 平定西域战图 考》的论文，对乾隆年间在法国印制的铜版画《平定西域战图》进行了详细考证，这项研究成果当时在国内还是首次发表。接着又对清代的民族文献《御制外苗图》、《黔南苗蛮图说》等文献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七、八篇论文，并以“清代民族图册综合研究”的课题投标教育部重大项目而一举中标，进行了长达猿年的古代云南、贵州民族专题研究。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组织全国众多专家学者，进行了历史上最为全面、最为科学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我发现，那次持续了几十年的大规模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的档案及其成果，全部保留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之中，于是，我又用两年多的时间，整理、编辑出版了 员卷的当代民族文献丛书《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如果说学术研究领域的跨度，似乎是从公元前猿世纪的西汉，来到了 圆世纪的新中国。

由于我在学术上喜欢“见异思迁”，我在从事民族文献研究的同时，还曾接受国家图书馆的邀请，承担了国家图书馆馆藏《历代日记丛钞》大型古籍文献的研究整理项目，历时两年半，组织力量并亲自动手对数百种古代文臣武将、驻外使节、驻藏大臣等人的珍贵日记进行版本鉴别、作者研究和价值分析，最后形成了 圆卷的古籍文献丛书，圆年由北京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

虽然如此，对于古代敦煌文献的研究，始终难以割舍，不但在教学中为研究生开设了“敦煌学基础”、“敦煌文献研究”等专业课程，也曾赴韩国忠南大学等地进行敦煌佛教的讲座，现

在，当取得了项目经费准备将自己的部分学术论文结集出版时，我首先想到的还是敦煌文献与佛教的研究，于是，便有了本书的问世。

这部文集共收集了 150 篇研究敦煌文献和佛教方面的文章，大部分曾经在一些书刊上发表，这次结集出版时，在内容上未作修改，少数文章的个别文字作了一些修订，因此保持了 150 多年前、150 多年前的原貌。正因为如此，这些文章在带有旧时学术水准的同时，也一定带有自己学术研究还较稚嫩的特点，有些研究或许还不够深入，结论还不够成熟，语言文字方面也许存在不少错误，对于这些不足之处，恳请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我将十分感谢。

作者序于中央民族大学社区 150 号楼

目 录

敦煌写本《授戒牒》初探	(员)
唐代佛教宗派与社会经济	(猿)
试论唐后期寺院经济的特点	(源)
敦煌遗书 杂号研究	
——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	(怨)
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员)
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十三件敦煌古写经	(员)
敦煌遗书《茶酒论》与藏族寓言故事《茶酒仙女》	(员)
敦煌汉文佛教文献の価値について	(员)
千古文化的百科全书——漫谈敦煌文献	(员)
后记	(员)

敦煌写本《授戒牒》初探

在数万件的敦煌遗书中，较完整地保存了几十件沙州（今甘肃敦煌）寺院为男女佛教信徒授戒的写本文书《授戒牒》。^① 这些《授戒牒》多数首尾完整，书写清晰，格式规范。每件牒文上均有千佛印或僧官印信，除一件尾缺者外，其余都有传戒师的署名。牒文涉及的年代，从北宋太祖乾德二年（~~961~~）至太宗雍熙四年（~~985~~），前后二十四载。因此，这批文献是宋初沙州寺院授戒活动的真实记录，为我们探讨宋初沙州地区的佛教状况及僧俗大众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佛教认为：“一切众生，初入三宝海，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② “夫受戒者，超凡鄙之秽流，入圣众之宝位也。”^③ 可见，释家十分重视戒律问题，将授戒、守戒看得无比重要。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授戒又是俗人出家或在家从佛修行的关键步骤之一。授戒既是佛教内部的重要活动，又反映着世俗百姓的某种社会意识形态，揭示着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因此，研究授戒问题具有探求僧、俗社会生活的双重意义，对弄清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大有裨益。本文打算首先对有代表性的几件沙州寺院的《授戒牒》文书进行考释，澄清前人对《戒牒》、《度

① 英、法所藏敦煌遗书中，有沙州《授戒牒》~~7~~件，本文仅以这些资料为对象进行探讨。

② 《菩萨瓔珞本业经》下，载《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略称《大正藏》）第~~9~~册~~1~~卷~~1~~第~~1~~页中。

③ 《大正藏》第~~9~~卷~~1~~第~~1~~号《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上之三，受戒缘集篇，第~~1~~页中。

牒》的模糊认识，然后对宋初沙州寺院的《授戒牒》进行整体研究，最后谈谈沙州《授戒牒》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不妥之处，渴望方家指教。

一、沙州《授戒牒》考释

日本佛教史专家中村元在其巨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指出：宋初规定，僧尼死后，度牒、戒牒、六念等凭证，需由寺主及地方公人予以作废，还俗者、逃亡者一样，因此，很少有古度牒存在。^①照中村的说法，戒牒、六念等佛家文献同样很少留传至今。的确，在浩如烟海的佛教载籍中，度牒、戒牒等文书实属罕见，如果没有敦煌遗书的面世，今人简直无法弄清戒牒等文书的原貌。几十件沙州《授戒牒》写本，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料价值。通观几十件沙州《授戒牒》，其形式与内容大体一致，许多戒牒除授戒时间、授戒弟子及戒品不同外，文字几乎相同。为了具体了解戒牒的实相，现根据敦煌遗书的缩微胶片，将几件典型的沙州《授戒牒》移录于下，并对戒牒中的难解词汇进行考释，然后谈谈戒牒与度牒的区别。

（一）缘月乾德二年五月廿三日沙州三界寺授娘子张氏五戒牒^②
南澹部州 员 娑诃世界 圆 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 猿
授戒女弟子 源 娘子张氏

^① 中村元《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册，第二篇第二章第五节，天华出版有限公司版，缘年缘月。

^② 以下录文均以缩微胶片为准，以杂代表斯坦因携至英国的文书，孕代表伯希和携至法国的文书。

獯牒得前件弟子，久慕良缘 缘，夙怀善意，求
灑出尘 远 之捷径 苑，祈入圣 愿 之广途，遂乃离火
纒陀 怨 之苦空 园，向无涯之觉路 员。吾今睹
斯真

遽 隐，方施戒条 员。仍牒知者，故牒。

雍 乾德二年五月廿三日

愿 奉请阿弥陀佛 员 为坛头和尚。 员 源

愿 奉请释迦牟尼佛 员 缘 为教授阿阇梨。 员 远

员 愿 奉请弥勒菩萨 员 苑 为羯磨阿阇梨。 员 愿

员 愿 奉请十方诸佛 员 怨 为证戒师。 员 园

员 愿 奉请诸大菩萨摩訶萨 员 员 为同学伴侣 员 园

员 愿 授戒师主释门僧正赐紫道真。

(二) 李愍儿 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八日沙州三界寺授李愍儿八
戒牒

员 南赡部州娑诃世界沙州三界寺授八戒牒

员 授戒弟子李愍儿

獯牒得前件弟子，白月 员 猿 垂光，八寒谭 员 源 而是
幻。 员 缘 红

灑 莲出水 员 匠，悟生死之〔无〕余。 员 苑，今则方驾牛
车 员 愿，将辞

纒 火宅。欲纲裂 员 怨 而须坚固，尘世出而坐宝华 猿 园。

遽 吾今睹斯直意，方施戒条 猿 员，仍牒知者，故牒。

雍 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八日授戒弟子李愍儿

愿 奉请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

愿 奉请释迦牟尼佛为阿阇梨。

员 愿 奉请弥勒菩萨为羯摩阿阇梨。

员 愿 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愿奉请诸大菩萨为同学伴侣。

愿受戒师主释门道真

(三) 杂原缘雍熙四年五月某日沙州三界寺授智惠花菩萨戒牒

愿南澹部州大宋国沙州三界寺授菩萨戒牒

愿授菩萨戒女弟子智惠花

愿得前件弟子，久慕胜因， 愿 志闻妙法，欲悟

愿为 愿 之教，先持有想 愿 之心，是故六根净
愿 而烦

愿随尘消，一性真如 愿 ，回路息 愿 。伏恐幽关
有阻，

愿以此为凭。事须给牒知者，故牒。

愿雍熙四年五月□日授菩萨戒智惠花牒

愿奉请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

愿奉请释迦牟尼佛为羯磨阿闍梨。 愿

愿奉请弥勒尊佛为校授师。

愿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愿奉请诸大菩萨摩訶萨为同学伴侣。

愿传戒师主都僧录大师赐紫沙门道真牒。

考释：

员 南澹部州：澹，沙州《授戒牒》中或作瞻，同意异写。州，亦作洲。南澹部州梵语作 愿 ，早期佛译为阎浮提。阎浮，澹部州之树名，提，洲之意。《释氏要览》卷下载：“阎浮提，又云剌部，即此洲名，在弥卢山南，故称南阎浮提。”^①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 愿 以为：“ 愿 部，树名也。旧经中或言剌

① 《大正藏》第 愿 册，第 愿 号，第 愿 页上。